



中国历史小丛书

邮电史话

YOU DIAN SHI HUA

。 中華書局出版

中国历史小丛书編輯委员会

主 編：吳 晗

編 委：尹 达 白寿彝 刘桂五 任继愈
吳廷璈 何茲全 何家槐 何干之
汪 篪 周一良 邱汉生 金灿然
邵循正 季鎮淮 陈乐素 陈哲文
侯仁之 郑天挺 胡朝芝 馬少波
翁独健 滕淨东 潘絮茲 戴 逸

(以姓氏笔划为序)

助 編：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历史教研室

邮 电 史 話

編 写 者 童新远
插 图 馬舜田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复兴門外翠微路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17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經售

787×1092毫米 1/32·1 1/2印張·23,000字

印数：00,001—40,620

1962年4月第1版

1962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統一書号：11018·312

定价：(5) 0.12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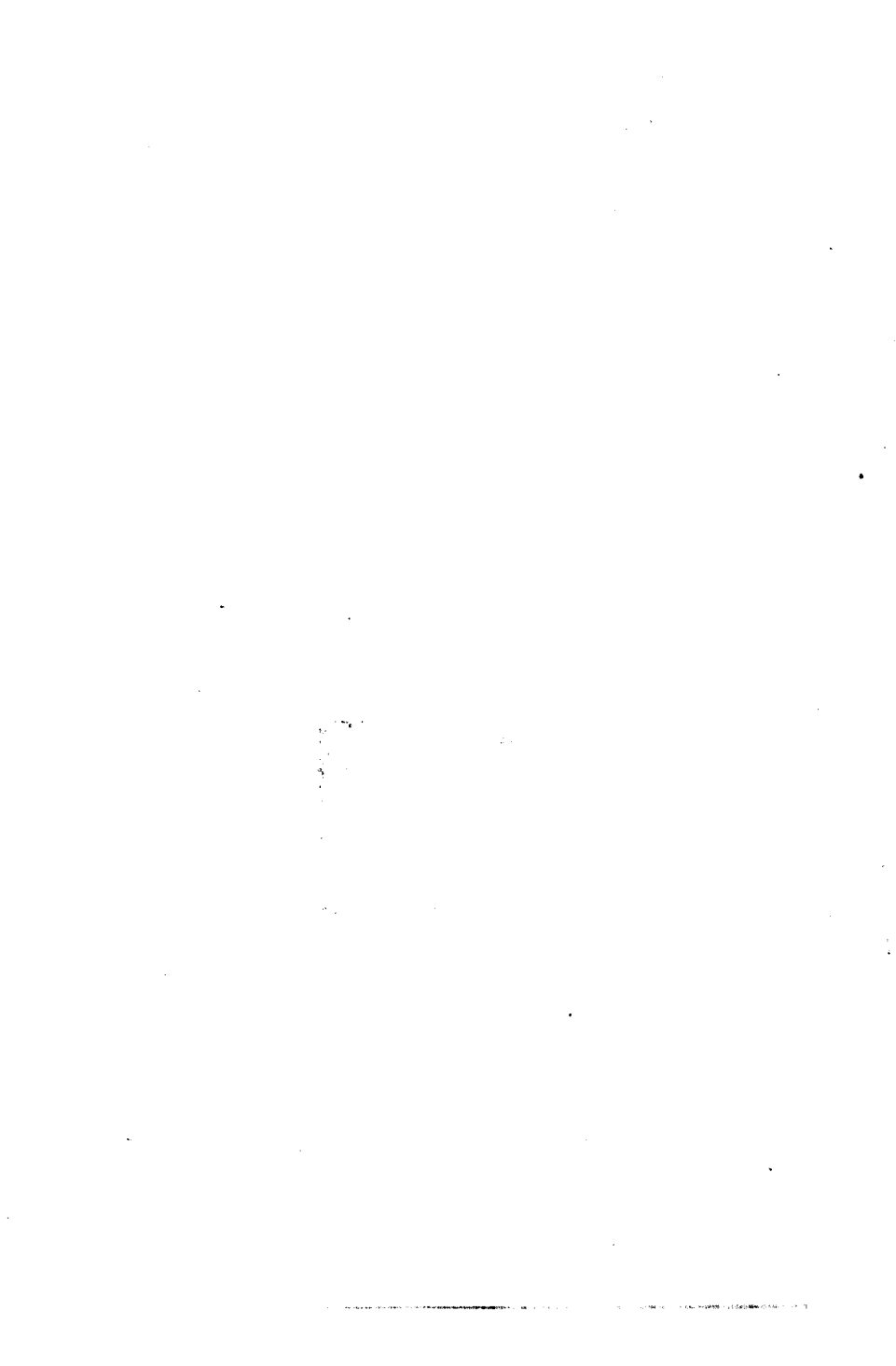
中国历史小丛书

邮 电 史 話

童新远編写

目 录

- 一、中国古代通信的发展..... 3
- 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統治下的邮电.....14
- 三、人民邮电的成长.....29



一、中国古代通信的发展

(一)从烽火台談起

在我国古代社会里，人們很早就使用通信的方法来互相联系了。根据古书记載和发掘出来的古代文物来推断，我們的祖先在沒有发明文字和使用交通工具之前，就已經能够互相通信了。当时人們通信，很可能是采取以物示意的通信方法。我国云南省境内，有些少数民族中的个别部落，在解放前还停滯在原始公社阶段。他們沒有文字，也沒有交通工具，可是却有原始的通信方法：例如景頗族有些部落，人們把辣椒送給朋友，表示自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載瓦族的青年人把一片叫做“得郎”的树叶送給他的女朋友，表示請她去赴约会；在佤族〔kǎ-wǎ〕族中，如果送的是火药或鉛彈，是表示要打仗了，如果送的是一块結晶的方盐，中間钻个小孔，那就是困难問題已經解决了的意思。从这几个例子里，我們不难想象古代人們是怎样用以物示意的方法来互相通信的。

以物示意的通信方法，是一种很原始的方法。后来，人們的来信越来越多，范围也越来越广，就开始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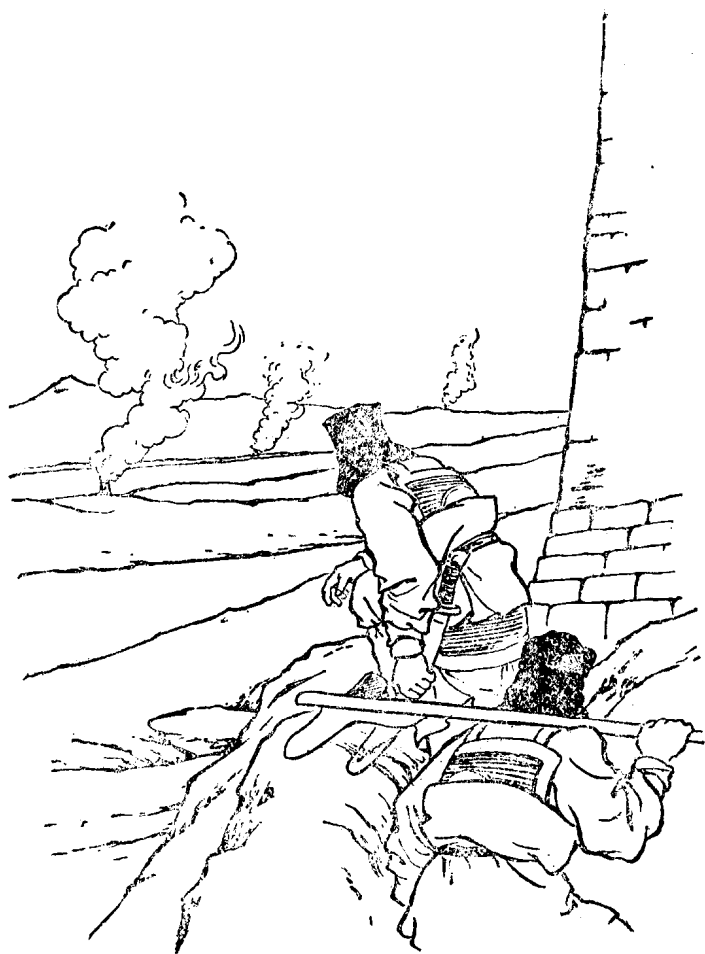
現了有組織的通信方法。

根据古史記載，在二千七百多年前的周朝就有了利用烽火传递信息的方法。那时，据说在边疆及通达边疆的道路上，每隔一定的距离，就筑起一座烽火台，接連不断。烽火台里装满柴草，遇到敌人入侵时，便一个接一个地点起烽火报警。各路諸侯見到烽火，就会派兵前来援助，共同抵抗敌人。

相传有这样一个故事。周幽王有个宠爱的妃子褒姒[bāo-sì]长得很美，可是总不爱笑。有一天，周幽王为了逗她发笑，就无缘无故地下令点起烽火。各路諸侯看到警号，都紛紛带兵赶到。結果自然是白跑一趟，上了大当，什么动静也沒有。这么一来，果然把褒姒逗笑了。可是后来到了真有敌兵入侵的时候，各路諸侯，看到烽火，都不再相信了，因而誰也不派兵来救。周幽王因为得不到各路諸侯的援助，抵抗不了敌人的进攻，不但自己被杀，西周王朝也因此灭亡。这个故事表明了有組織的通信方法在中国很早就出現了。

中国历代王朝，利用这种烽火报警的方法来传递軍事情报，相沿很久。从后来发掘出来的“汉簡”〔注〕可以知道：在两汉时代，从河西四郡（今甘肃武威、张掖、

〔注〕在造纸技术还没有发明以前，我国最早的书籍，用竹簡写成。汉代的竹簡，就叫汉簡。



古代用以报警的烽火台

酒泉、敦煌），一直到盐泽（今新疆东部罗布泊），都有烽火台設置，而且規模很大，据說是“五里一燧，十里

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寨”。这些烽火台由各地地方官吏管轄。在地方最高长官太守以下，还設有不同等級的管理烽火台的官吏，如都尉、侯官、彰尉、侯长、燧长等；各台还按照远近大小，分別配置若干兵卒。举放烽火的方法，昼夜不同，白天举烟，夜晚放火。此外，还采用各种不同的暗号来表示进犯敌人的多少，例如敌人在五百以下的放一道烽火，五百以上的放两道烽火，等等。这种有組織的通信方法，对防守边疆、抵御敌人，曾起过一定的作用。这种通信方法，直到明、清时代，許多地方还在使用。例如山东省的烟台市，就是因为明朝在那里設置狼烟台，防止倭寇入侵而得名的。

用烽火传递軍情，固然很快，但它不能把詳細的敌情从边境传达上来，更不能把上面的命令传达下去。所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軍事的需要，还形成了传送官府文书的更严密的邮驛[yì]制度，和烽火配合使用。

(二)兩千多年的驛站通信

周朝时期，諸侯都自成一个国家。他們为政治、軍事上的需要，都在大道上經常設有驛馬和邮車，往返传送官府文书。春秋时代的大思想家孔子就曾說過：“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意思是說，他所提倡的道

德学說，会比邮驛傳送命令传播得更快。可見那时邮驛通信不仅已相当完备，而且速度也相当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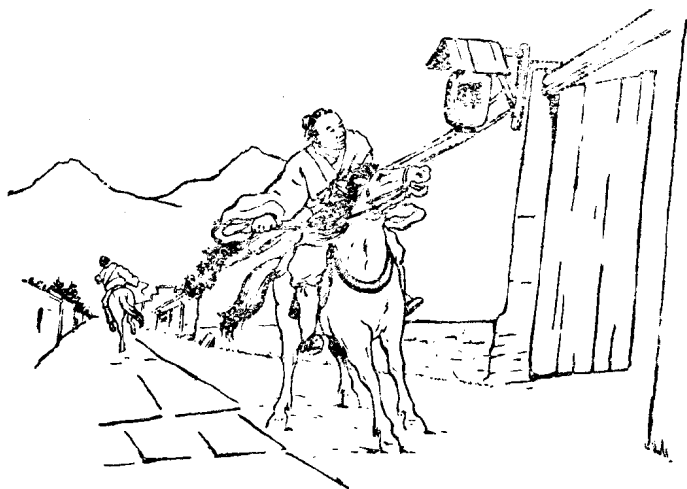
古书《左传》上有这样一个故事：秦国（在今陕西一带）和晋国（在今山西南部一带）图謀联合进攻郑国（在今河南郑州一带）。郑国是一个小国，处于秦晋两个大国的势力威胁之下，自然抵抗不住。郑国便派使者到秦国建議：“秦郑之間隔着一个晋国，灭亡郑国，只有利于晋，而不利于秦。不如秦郑結盟，将来秦国到东边来，郑国还可以做秦国的东道主。”秦国认为有理，就派杞〔qǐ〕子、逢孙、楊孙三人带兵驻守郑国。郑国为了表示和好，将郑国国都北門的钥匙〔yào-shi〕交給三个使者管理。那知杞子等却向秦密报說，他們已掌握了郑国北門，請派兵偷襲郑国。可是当秦国派往偷襲郑国的軍隊走到滑国（在今河南洛阳东面）地方的时候，便被郑国商人弦高发觉。弦高感到本国危在旦夕，便一面假装成郑国特派使者，用他販运的十二隻牛，去犒〔kào〕劳秦兵，暗示郑国早已得到消息，有了准备；一面急忙利用通往郑国的邮驛，星夜給国内报信。郑国得到这个消息，立即严密戒备。秦兵发现郑国已經作好应战准备，只得停止前进，順便灭掉滑国而回。可見当时的邮驛制度是有很大作用的。

邮驛通信随着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发展，逐漸完备

起来。秦始皇統一中国后，在全国修筑馳道，“車同軌”，“书同文”〔注〕，更促进了邮驛通信的发展。到了唐朝，这种制度更是盛极一时。唐朝的邮驛，分陆驛、水驛和水陆兼办三种，共有一千六百多处，其中水驛二百六十多处，水陆兼办的也有八十多处。邮驛的行程也有明文規定，如陆驛規定馬每天走七十里，驴五十里，車三十里。各級官吏使用車馬多少，也有一定限制。不按規定办事的要受到处分。遇有紧急事情，驛馬一天能跑三百里以上。詩人岑〔cén〕參曾写过这样一首描写邮驛的詩：“一驛过一驛，驛騎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隴〔lǒng〕山头。”公元755年（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安祿山在范阳（今北京大兴县附近）起兵反对唐朝，当时唐明皇（即唐玄宗）正在华清宮（今陕西临潼县境），离范阳有好几千里路，可是六天之內就接到了这个消息。可見唐朝邮驛通信的組織和速度已經达到很高的水平。

元朝时期，由于軍事活动范围的扩大，通信事业就更加发展了。那时仅在中国境內，就設有驛站一千四百九十六处（元朝称邮驛为站赤，所以后来通称邮驛为驛站），在中国以外的驛站还不計在內。

〔注〕“軌”就是兩輪之間相距的度数。战国时，車軌的寬狹不一，秦始皇統一中国后，規定車軌一律六尺寬。同时秦始皇又廢除了原来的文字，改用一套叫做“小篆”的新文字，把全国的文字統一起来。



驛騎如星流

有一个在元朝做官的意大利人馬哥孛羅，在他所著《馬哥孛羅行紀》这部书里，曾提到元朝每二十五里必設一处驛站，驛馬共有三十万匹。每个驛站都有宏大华丽的房屋，內备床舖，被褥皆以綢緞制成，住宿时所需物品，无不俱全，专为欽使来往休息之用。他說，即使国王来住，也必定觉得非常舒适。他还說，这样大的驛站，足有一万多处。馬哥孛羅的描写，可能有些夸大，但元朝驛站規模之大，可以想見。

另外元朝还沿襲宋朝的办法，在各州县广泛設置“急遞舖”。这种急遞舖是專門传递官府の紧急公文の，有点象現在的軍邮，全国估計約有两万处。每舖有几

个舖丁，日夜不停地递送文件。这些舖丁腰里掛着鈴鐺，手里拿着枪，夜間还要拿着火把。他們走到路狭地方，就用力振鈴，叫路上車馬行人让路。在快到下一个急递舖时，也在很远地方振鈴，叫下舖預先作好准备，接递文书，继续前进。这样，一舖接一舖不停地传递，一昼夜規定要走四百里。

明朝驛站，基本上沿袭旧制。清朝中叶以后，現代郵政逐漸发展起来，代替了古老的驛站制度。

两千多年来的驛站通信，虽然在边防和經濟、文化的交流等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对广大人民却是个很重的負担。例如，唐明皇为了让他的宠妃楊貴妃吃到新鲜荔枝〔h〕枝，就为她从长安（今西安）到四川涪陵专設了一路驛站，昼夜飞驰，运输荔枝。唐朝詩人杜牧所写的“一騎紅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两句有名的詩句，就是对这件事的諷刺。又如清朝康熙年間，貴州巡抚佟〔tóng〕凤彩就曾上书皇帝，訴說貴州地区驛站的痛苦情况。他說，天下最苦最累的莫过于驛站，而驛站最险最远的又莫甚于貴州。夫抬一站，势必足破肩穿，馬走一站，也必蹄癰〔qué〕脊烂。甚至苗民被逼得不能种地織布，死的死，逃的逃，流离失所的一天比一天多。其实，历史上各个朝代的驛站通信都普遍有这种現象，这不过是两个典型例子而已。

(三)民信局和侨批局

驛站是官府的通信組織，只許傳送官府文書，除了宋朝還准許高官顯宦附寄家信之外，一般都不准附寄私人信件。既然這樣，私人如遇有緊急事情，需要通信，地主、富商還可以派家丁或雇腳夫遠道傳書；一般老百姓只有托人捎帶，不但輾轉傳遞，緩不濟急，而且往往延誤或遺失。我國古書中記載了許多“鴻雁傳書”一類的事情，古代人民通信的困難，可以想見。後來，由於生產的發展和生活的需要，人們的往來頻繁，出外經商的、做工的，以及在戰亂年代被迫出征的戰士和遠離家鄉逃荒避難的人們，都需要和家鄉親友通信。特別是各地商人，為了互相交流商情、商談貿易、寄遞帳單等，更迫切需要通信。於是民間傳遞信件的业务就應時而起。大約在唐朝的時候，長安、洛陽之間，就有了主要為民間商人服務的“驛驢”。當時還有一種叫做“飛錢”的辦法，就是各地商人把在長安販賣貨物所得的錢，存入各地方官府駐長安的機構，再凭收據到各地方的官府如數取錢。這實際上就是匯兌業務的萌芽。當時還發行了一種叫做“邸〔dī〕報”的手抄報紙，好象現在的報刊發行一樣。到了明朝，就出現了專為民間傳遞信件的民信局。西南各省的民信局叫

作“麻乡约”，相传起源是这样的：湖北麻城县孝感乡被迁往四川开垦的农民，由于想念家乡，相约每年推同乡回乡几次，来往带送土产和信件，后来就形成专业的民信局。

民信局开始出现于沿海沿江通商方便的城市，以后逐渐发展到内地，直到东北和西北各省。清朝道光、咸丰、同治年间（公元 1851 至 1874 年）是民信局发展最盛的时期，当时全国大小信局总共有几千家。自从清朝政府与英国签订丧权辱国的五口通商条约以后，上海商业和交通畸形发展，各民信局便纷纷扩大组织，在上海设立总号，在各地商埠设立分号、联号或代理店。规模小的民信局，就联合起来营业。这样，在全国各商埠和交通较便的大市镇联成了一个稀疏的民间通信网。

民信局是一种商业组织，由东家（俗称老板）出资，雇用店员经营。因为它是以谋利为主要目的的，所以凡是能够获利较多的地方，各民信局就争设机构和路班，无利可图的偏僻地区就无人注意。民信局的服务对象也主要是商人。为了招揽业务，各民信局还给他们的主顾以种种便利。例如：在晚间商店结帐后，派人到各商店，登门收揽邮件和汇款。长年主顾还可以记帐总付信资，甚至还可以打折扣。

从很早的时候起，广东、福建等省沿海地区的貧苦人民，到海外謀生的很多。还有一些人，是被帝国主义强盜驅到外国去作苦工的。这些旅居国外的侨胞，和他們的家属通信，或者把千辛万苦掙得的一些零星銀錢寄回家里，起先都是托人捎带，很不方便。后来，广东和福建有些民信局就向海外发展业务，組織了“侨批局”，专门办理旅外侨胞的通信和汇兌业务。因为福建方言把“信”叫做“批”，把华侨汇款附寄的信叫做“侨批”，所以把这种寄递华侨信件和汇款的机构叫做“侨批局”。侨批局除在國內出国华侨較多的城鎮開設外，还在菲律賓、越南、印度尼西亞、馬來亞、北婆羅州、泰国等地設立分号。据 1930 年統計，全国登記的侨批局共有一百八十家，所属國內外分号共七百多家。到 1948 年全国解放前夕，还有侨批局一百多家，國內外分号共一千多家。它們对便利海外华侨寄信汇款和与祖国联系起了积极作用，受到了海外广大侨胞的欢迎，本身也获得丰厚的利润。

自从外国資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封建統治階級並沒有設法对中国官办的驛站和民办的民信局以及侨批局加以改革，而是一任侵略者侵夺我国的邮权。民信局和侨批局虽然遭到侵略势力的打击和摧殘，但是由于它們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受到人民群众的信賴，还維

持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没有被扼杀。一直到1935年，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勒令限期结束的高压政策之下，民信局终于被淘汰了。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还企图取缔侨批局，但因为遭到广大侨胞反对，没有全部实现。

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统治下的邮电

(一)打破中国大门，闯进“客邮”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府长期闭关自守的大门被资本主义侵略者打开，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1842年，昏庸腐朽的清政府，同英国侵略者签订了卖国的“南京条约”，允许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商埠，还把香港割给英国。当年，香港的英国当局就在香港开办邮局，后来又将邮局扩展到中国各通商港口，作为香港邮局的分支机构。从此以后，法、美、德、俄、日等国也各自在中国领土上设立他们自己的邮局，其中以日本所设的最多，分布最广。

各侵略国纷纷在中国私设邮政，侵犯中国主权，清政府还美其名曰“客邮”。这些所谓“客邮”，没有任何条约根据，也没有取得清政府允许。那时在北京、天津、沈阳、上海、广州、汉口、重庆等大城市及锦州、哈尔滨、山海关、张家口、济南、青岛、烟台、南京、镇江、苏州、杭

州、福州、厦門、汕[shàn]头、北海、海口、芜湖、九江、宜昌、长沙、昆明等几十个沿江沿海的中小城市，而且远至新疆的烏魯木齐、疏附、塔城，內蒙古的海拉尔，吉林的琿[hún]春，云南的蒙自等边远地方，以及东北南部的广大县城和乡村，到处都遍布“客邮”。这些“客邮”，都是为外国侵略者对中国进行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侵略的目的服务的。有些国家还利用邮客大量贩运鴉片、吗啡等毒品，大量走私，偷漏关税。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1919年举行的巴黎和会上，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竟确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权利，不归还中国，因而激起广大中国人民的愤怒。当时北洋軍閥政府，在广大人民压力下，曾向巴黎和会提出了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特权的七个条件，包括收回邮电通信权利等，但是完全遭到否决。只有俄国新成立的苏維埃政府，于1919年7月发表对华宣言，自动放弃了沙俄在华一切特权，沙俄的“客邮”才首先被取消。

随后，在1921年末至1922年初的华盛顿會議上，美帝国主义为了阴谋瓜分中国，反对日本独霸远东，重新提出了“門戶开放，机会均等”的要求。北洋軍閥政府利用美、日这种矛盾，再次向帝国主义各国提出收回邮权問題。当时，参加會議的英、美、法、日四国在中国